

大众话语与精英文化思想遗产

——现代媒体文化困境现象研究

Popular Discourse and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Heritage of the Elite

——Research on Cultural Dilemma in Modern Media

林荣茂

Rongmao Lin

福建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
中国·福建 福州 350007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摘要】现代新媒体带来的繁荣表象之下,新的文化危机日益显现,其最为突出的表现为许多社交媒体传播内容中知识与道德要素的缺失。论文将回顾精英文化传统,分析现代媒体文化传播的不合理性及大众文化话语的双面性,为其成因与对策的分析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Abstract】Under the surface of the prosperity brought by modern new media, a new cultural crisis is increasingly emerging, the most prominent manifestation of which is the lack of knowledge and moral elements in many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contents. This paper will review the elite cultural tradition, analyze the irrationality of modern medi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double-sided nature of mass cultural discourse,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it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媒体;文化研究;大众文化;文化困境;精英文化遗产

【Keywords】media; cultural studies; mass cultures; cultural dilemma; cultural heritage of elite

【DOI】10.36012/lcs.v2i1.1493

1 精英文化传统与话语集中立场

马修·阿诺德在 19 世纪开启了文化主义的先河,其“文化是少数人的专利”等与大众文化批判相关的文化理论也成为 F.R.利维斯乃至后世伯明翰学派在学术论述中的主要理论来源。19 世纪的英国阶级矛盾趋于激烈,斗争频发,造成了阿诺德所述的一种“无政府状态”,即社会在缺乏文化教化的情况下逐渐失序^①。阿诺德认为,大众要么跟随中产阶级,要么自甘沉沦,即往往在价值观的接收中呈现出被动的一面——在今天大众传媒极度发达的时代语境下也确实如此,“子弹理论”很大程度上并未过时。因此,阿诺德认为文化应先为先知先觉的少数人所享有,再由他们向大众推广,发挥社会思想引导与教化的作用,为社会创造秩序,即属于少数人的“文化救世主义”^②。这样的控制性立场,在话语权分散于各非精英阶层的今天难以想象的。阿诺德虽然明确否定大众在文化与思想上的话语权,但却远不及 F.R.利维斯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比起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全盘否定思想则更遥不可及。

2 利维斯与大众文化批判遗风

F.R.利维斯继承了马修·阿诺德的精英文化传统,他站在文学批评的角度,阐述了文艺作品仅能为少数人所欣赏,而大众文明的冲击则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文化精英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其占据的中心也被低劣趣味的虚假权威替代。F.R.利维斯在其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这样描述他那个时代的“文化困境”：“现代读者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符号群,它们的变体和数量如此多到叫人不知所措,以至于他除非才具过人,或者有格外的爱好,委实是难于来作甄别,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总的文化困境^③。”文中处处都折射出阿诺德对文化危机的焦虑性阐说。于是阿诺德精英文化思想下的利维斯主义由此形成,并成为英国文化研究兴起之前的传统权威理论。其内核从今天的传播学角度来看,并不是对具有可操控性的大众传播的全盘否定——在此需要避免混淆“大众传播”和“大众话语权”的含义。因为利维斯主义批判的是由非精英阶层的个人话语主体形成的大众文化,而最能首当其冲的便是在今天被称为“自媒体”的网络传播方式,其最典型

特点便是大众拥有话语权,并且大众群体的发声、评论不受阶层与知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完完全全地打破了对于文化话语权“宁缺毋滥”的精英文化传统。

3 网络社交媒体中的文化困境与其弊端

当然,现代社会呈现出的多元繁荣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利维斯主义否定大众文化是过于偏激的行为。无论是通俗文学、电影、商业广告等,这些在 F.R.利维斯、西奥多·阿多诺等学者间众矢之的的文化产品为大众所创造了不可低估的精神价值,它们也确实比 F.R.利维斯“高雅趣味”的精英文化美好蓝图要实际得多,因此社会文化合理地发生了与其背道而驰的变革。但是,即使是对大众文化多有认可的理查德·霍加特也站在道德评价的角度,对 20 世纪 30 年代后逐渐失去判断力的大众文化持极度担忧的态度。他引述了他曾批判过的 F.R.利维斯的批评话语,并再次指出了这种文化形式走向中道德、知识因子的日益缺失,以及带给知识分子的可怕威胁是“感受性分离”和精神、道德危机^[4]。而且这样的“文化悲观主义”在今天看来也并非杞人忧天。

基于能够将问题突出化的巨大网络流量基础,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与社交问答社区“知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媒体传播的“文化困境”。微博于 2009 年创立,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草根”和“大 V”们都可以在其中自由地制造话题和社会热点、发表对各类时事资讯的评论。而其中的“文化困境”典型表现在网民对各类社会话题的“选择性理解”而导致的极具主观性的评论,这些评论很多会通过平台本身特性成为其之后相关信息接触者进行理解时的舆论风向标准而构成一个庞大的、不稳定的符号群,而在这个符号群中,缺乏道德关怀与知识标准的、娱乐性且哗众取宠的评论话语将成为微博网络拟态环境中的危险物质,不断地排斥公知真理、挑战并影响着后来者的价值观。并且话语主体的动机往往符合“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不过是马斯洛在需求层次系统中并未给予太多权重的、精神的自我满足需要,甚至可以概括为“娱乐”需求。正如《娱乐至死》中所提到的那样:“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5]。”而且这种“娱乐”还要以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为代价,以大力彰显个性、离经叛道、阻碍个人公正地理解、思考的内容,借由受众心理的本身缺陷,将“沉默的螺旋”带来的负面影响极具夸张性地放大。

同样,被中国大陆网友戏谑地称为“编乎”的知乎也为不

限知识水平的大众提供了建立权威、挑战真理甚至违反公知的话语表述机会,充分满足了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的用户们的逆反心理,成为“反智主义”泛滥的重灾区。从传播效果来看,个人话语即自媒体的泛滥势必重现马修·阿诺德所阐述的文化传播“无序状态”,传播世界夹杂着噱头和谎言,真实与理性反而被无视^[6]。有的人认为这是“后现代”挑战传统的正常景象,实际上却严重忽视了后现代主义是对更加具有客观性的真理的追求,而“文化困境”带来的是文化、精神与道德败坏的、远远低于有思考性的知识水平线的毋言对错的话语危机,这不得不让学者们再次思考精英文化思想遗产的现代价值。

4 文化唯物论与研究对策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对大众共同创造文化的合法性进行了有力的确证,即无论是底层阶级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是客观文化的一部分,并由此反映出社会整体的生活方式。其分析推理中也展示出了更符合现代人思想的民主平等意识。不错,“共同文化”比“精英文化”更顺应发展的潮流,但在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的同时,也应和研究“文化困境”的成因一样,应该避免“新媒体环境多元性、开放性”“民主思想”等内层因素的老生常谈,以及要不要回归“利维斯主义”等毫无意义的辩证死循环。因为精英主义话语霸权终结的新媒体时代不可能轻易倒退,其“文化困境”的最大问题也在于大众话语权的泛滥,而不在于大众文化的合法性本身。解决“文化困境”的首要之举是将眼光置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传播环境当中,从文化水平、媒介以及具体化的媒体传播平台缺陷等去思考成因。“少数人”如何合理继承精英文化遗产的积极之处、合理介入大众传播来引导社会文化与思想道德舆论?网络新媒体在保证公共话语权的同时,如何使大众话语在理性的范畴内合法地传播?这些问题及其延伸将使传媒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无法置身事外,并因此付诸于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
- [2]陆扬,王毅.世界文化产业导论[G].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 [3]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M].Cambridge:Minority Press,1930.
- [4]张瑞卿.F.R.利维斯与文化研究——从利维斯到霍加特,再到威廉斯[J].文艺理论研究,2015,35(1):205-214.
- [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6]张众.自媒体时代大众传媒话语权的嬗变[J].今传媒,2015,23(9):152-154.